

连续与破裂：中华文明与美洲中部地区文明比较研究的启示

李新伟 刘 鑫

关键词：中华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 玛雅文明 比较研究 宗教权力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Olmec Civilization Maya Civilization Comparative Study Religious Power

ABSTRACT: Notable similarities emerge between Chinese civilization during incipient and early developmental periods and Mesoamerican civilization: cosmological order fundamentally legitimized social order,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cosmological order dictating the planning of core sites and ceremonial centers; both regions emphasiz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religious authority, where leaders functioned as paramount mediators between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realms. However, these parallels do not validate K.C. Chang's dichotomous model of "continuum" versus "rupture" in civilizational trajectories. The most promising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general social theory likely lies in elucidating how religious concepts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distinctive Chinese political wisdom that forged a unified civilizational model.

中国考古学，其研究主题自然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融多元为一体，绵延不绝五千多年，特质鲜明。中国考古学要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自然需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但我们越是心系中国，就越应该胸怀世界。构建“最中国”的考古学，需要“最世界性”的视野。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深入认识，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对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性”及以文明互鉴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进行了更深入而完整的思考，提出：“一个着眼在世界性上的考古学者，在研探中华文明起源时，至少

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第一个，是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有多大的重要性？”“第二个方面，应该是探讨世界史关于文化、社会变迁模式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材料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1]。他所在的哈佛大学，汇集研究世界文明的优秀学者，更是美洲中部地区文明研究的重镇，引发他对中华文明和美洲中部地区文明比较研究的最初科学尝试，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概念，认为美洲中部地区文明和中国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

作者：李新伟，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刘鑫，北京市，102488，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代、不同地点的产物”，走过了同样的“连续性”发展道路^[2]。

2000年至今的二十余年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壮阔历程逐渐清晰；同时，中国考古学家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蓬勃展开，以世界文明的视角对中华文明的反思日益深入。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大课题予以支持，考古工作正式展开，对编号为8N-11的科潘贵族居址进行了全面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者在美洲中部地区主持的第一个考古项目。该项目成果丰硕，为科潘王国发展兴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引发笔者从文明互鉴的视角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与美洲中部地区文明相似性的初步思考。

一、宇宙秩序

美国考古学家诺曼·尤费（Norman Yoffee）等提出，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依赖于“秩序”（Order）的确立，而社会秩序的建立总以宇宙秩序为依托。统治者通过宣示对宇宙秩序的掌控和与神祇沟通的特权，获得治理人间社会的合法性（Legitimacy），聚集财富（Wealth），构建早期国家社会^[3]。

公元前1300年前后，墨西哥湾地区圣劳伦佐（San Lorenzo）这一宗教和行政中心的出现，标志着美洲中部地区最早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Olmec Civilization，公元前1300~500年）的形成^[4]。遗址核心建筑群清楚宣示了依托宇宙秩序建立人间社会秩序的意图。中心区是将自然台地人工加高7米形成的巨大台基，顶部面积达72万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50米。新近开展的高分辨率激光雷达航空拍照显示，顶部存在一个几乎指向正北的南北狭长、东侧中部突出的“凸”字形广场，其东西两侧各有10个对称的人工土台。大台基南侧有另一组堆筑建筑，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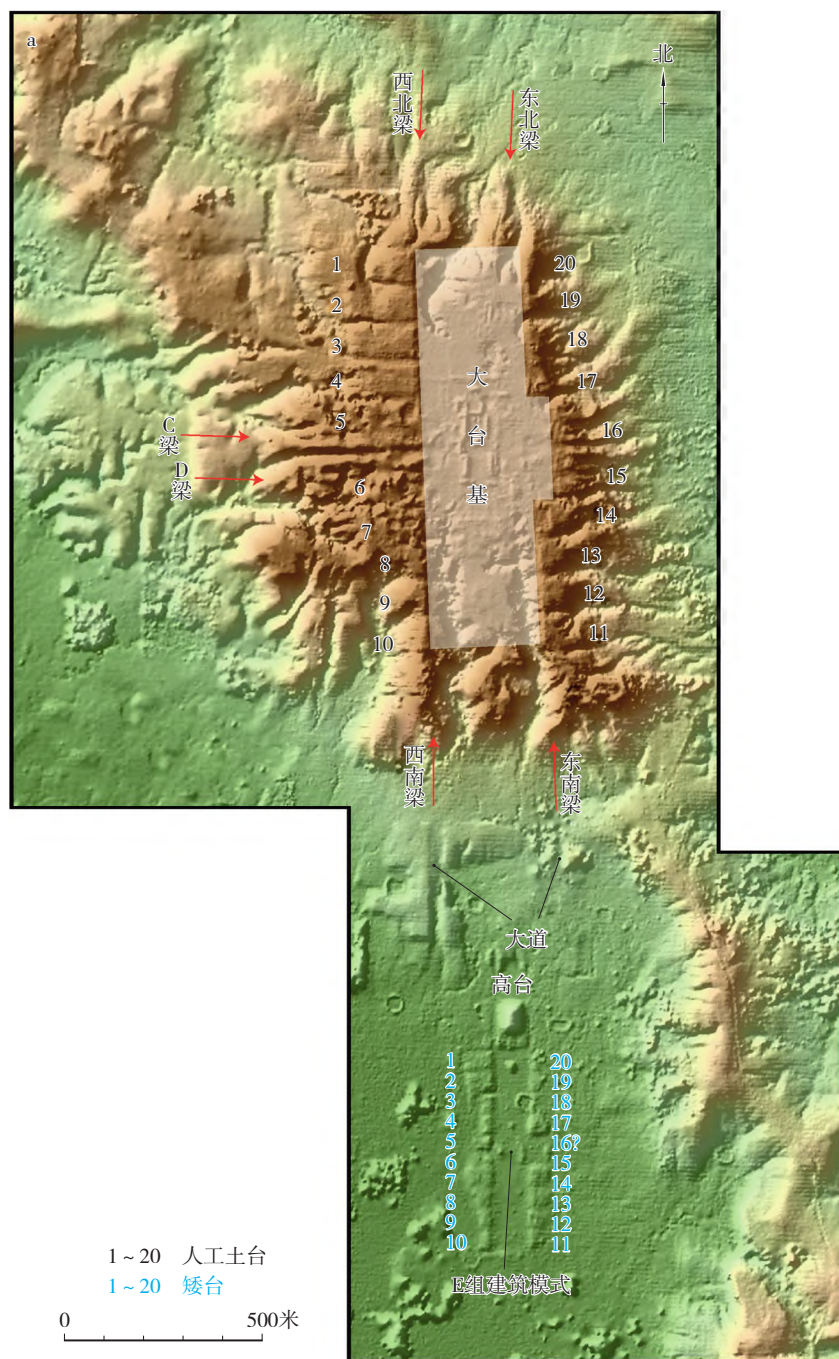
北侧为金字塔式高台，南侧为东西两列各10个对称分布的矮台^[5]（图一）。20在美洲中部地区文明中是非常重要的数字：计算系统为20进位制，卓尔金历以1到13与20个日名相配，形成260天的循环；以365天为一年的近似太阳历，有18个月，每月有20天，年末加上5天。最著名的长历法中，不同时间单位之间，也是20进位（只有大约相当于年的单位为18个20天）^[6]。此外，多处遗址发现长条形台基和方形台基组成的“E组建筑模式”，多认为与天文观测相关^[7]。

公元前900年左右，圣劳伦佐突然衰落，奥尔梅克文明的中心转移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拉文塔（La Venta）。遗址中心仍为仪式空间，核心是一座人工堆筑的边长150米的平台，上为高30多米、体积9万立方米的土筑金字塔，模仿附近的图什特拉火山，象征天地初开时升起的圣山^[8]。北端以土墙圈出长方形下沉广场，代表冥初之海。广场内有三个低矮土台，象征天地初开时创世神放置的三块巨石（图二）。仪式建筑的朝向均为北偏东8度，正是8月13日夜晚银河呈南北向时的方向，那一天是墨西哥湾地区第二个太阳直射日。在后来的玛雅文明中，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也被认为是其所在时间纪元的起点。

模拟天地初开场景和与天文观测及历法相关的建筑的出现，均是对宇宙秩序的展示。

奥尔梅克文明虽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突然衰落，但其开创的文明传统被继之而起的特奥蒂瓦坎文明（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和玛雅文明（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900年，其中公元250~900年为其最繁荣的“古典时代”）传承和发展。

公元1世纪，占据墨西哥高原盆地的特奥蒂瓦坎以20平方公里的面积和8万的人口规模成为美洲中部地区最强大的都会^[9]。城市中心为以“死亡大道”贯穿的仪式中轴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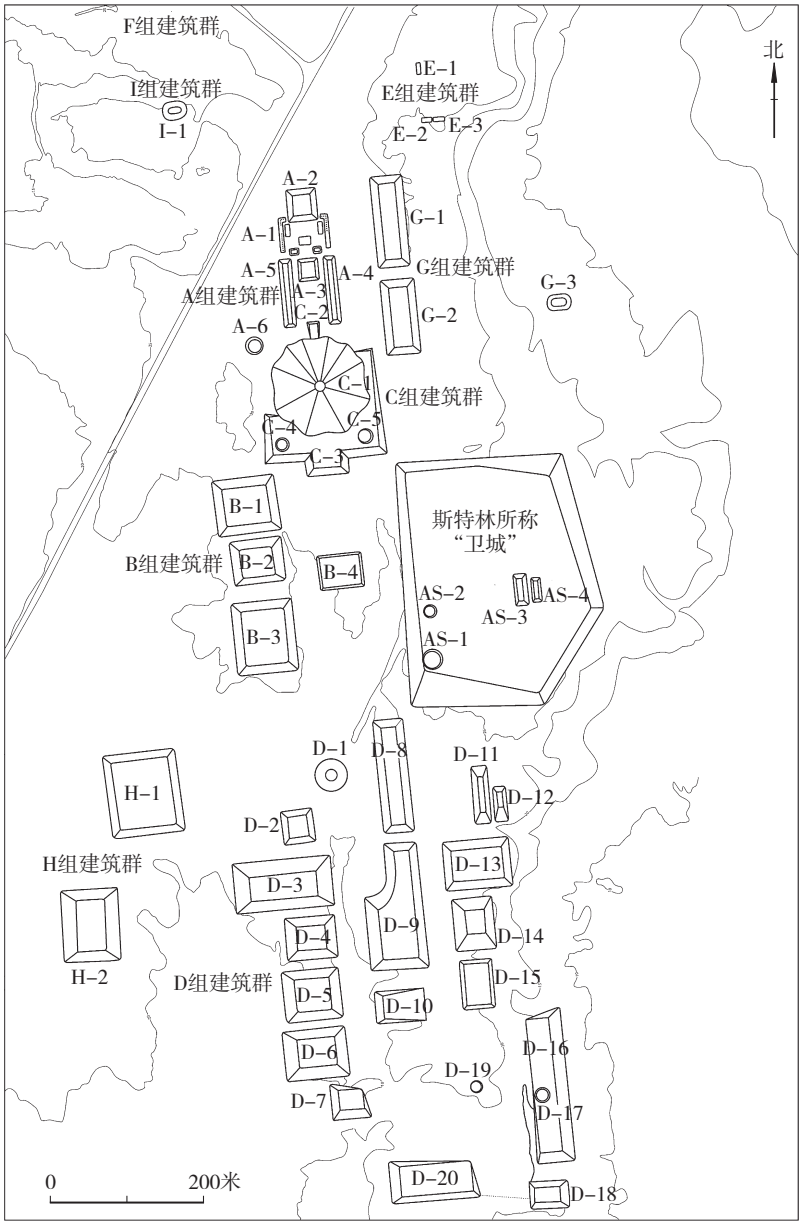
图一 圣劳伦佐遗址核心区航拍照片

(据Takeshi Inomata, et al., Origins and Spread of Formal Ceremonial Complexes in the Olmec and Maya Regions Revealed by Airborne Lidar, Fig.4改绘,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5, No.11, 2021)

北端月亮金字塔可能与水神和带来降水的风暴之神的祭祀有关^[10]。太阳金字塔高63、底边长216米，是当时整个美洲中部地区最高大

的建筑，其形态模仿城市南部的自然山峰。这里是举行迎接新纪元、新政权建立、新宫室或庙宇奠基等重要仪式的场所^[11]。羽蛇神庙金字塔和前面宽阔的广场共同象征着混沌初开时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圣山和周围的水世界，其地下隧道埋藏着大量玉器等充满宗教力量的器物（图三）。

玛雅文明诸城邦更是深得奥尔梅克文明传统之精髓，科潘城邦王室区就是神圣空间构建最佳范例之一^[12]。巨大的第16号金字塔式神庙，为此神圣空间的核心圣山，金字塔面对的西庭象征冥初之海，摆放着冥界之花睡莲的石雕。科潘贵族家庭在建筑自己居住的庭院时，也会考虑宇宙秩序的表达。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就是很好的例子^[13]。该居址为被四面连成一体石砌台基封闭的四方院落，门在南侧。北侧台基上的中心主建筑有祖庙的性质，台阶下埋葬了两位重要祖先，以赋予建筑生命灵力^[14]。西方为死亡之地，建筑上有表现玉米神死亡和在龙



图二 拉文塔遗址核心区域平面图

(引自Arlene Colma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A at La Venta, Tabasco, Mexico: A History of Buildings, Burials, Offerings, and Stone Monuments*, p.5, Figure 2, M.A.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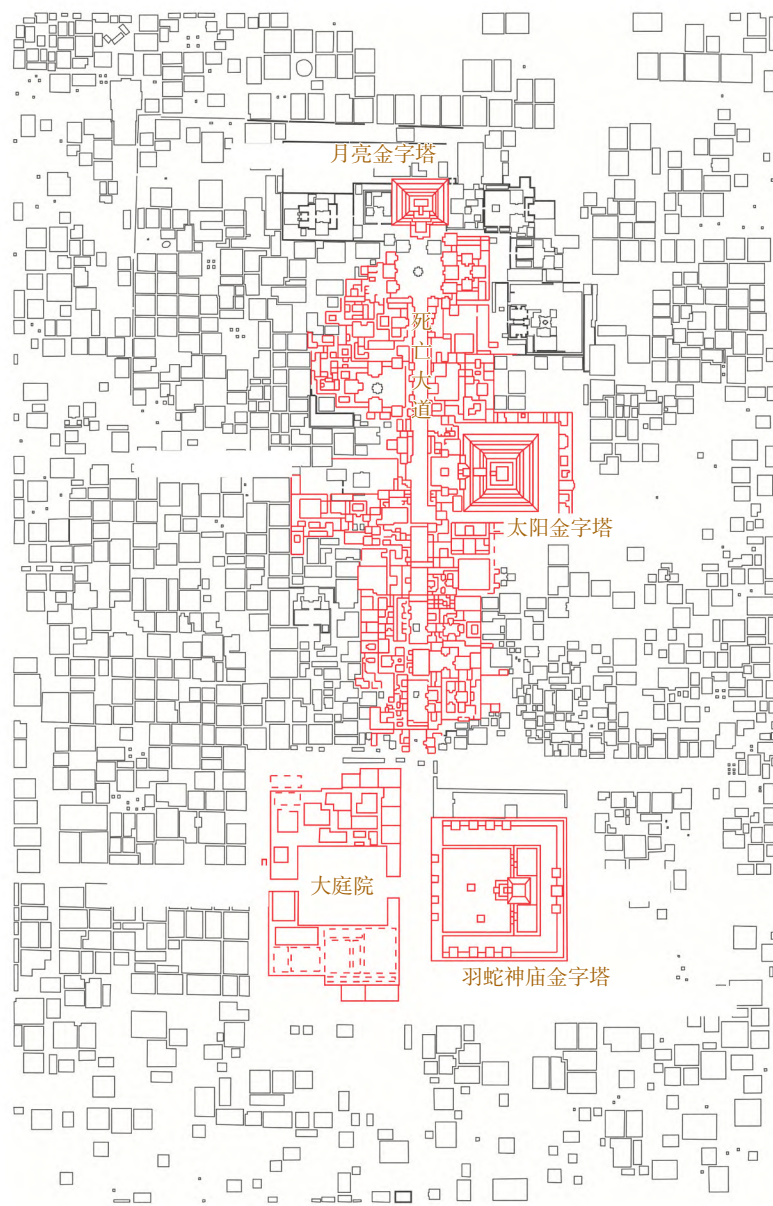
头神鸟腹中重生的雕刻(图四);东方为重生之地,建筑雕刻的主题是完成重生的玉米神和雨神带来万物欣欣向荣。

可见,在美洲中部地区,对宇宙秩序的强调,一直是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对宇宙秩序的表现,也一直是城市规划的核心。

距今6000~5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均发生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形成苏秉琦定义的“古国”级别的复杂社会^[15]。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领导者选择依靠宗教获得和维护权力、凝聚广大人群的策略,形成以“天极宇宙观”为核心的宗教^[16]。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即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仪式圣地^[17]。第二地点Z3祭坛由逐阶上升的三重石砌同心圆坛组成,象征太阳在二分二至运行的轨道^[18]。内圈的内侧和内外圈之间摆满无底筒形器。该类器物上常装饰对鸟纹^[19],烘托群鸟环绕的“天界”气氛,神巫立足坛顶,如在天上。很明显,以大规模人工建筑模拟自然和神话传说中的场景,物化天文知识和宇宙秩序,也是红山文化圣地构建的要旨。

距今5100年左右,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完成

了早期国家政体的构建,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重要实证。良渚早期国家的领导者,“熔合”了红山文化开创的以宗教权力促进社会发展的道路^[20]。良渚遗址群中的瑶山^[21]和汇观山^[22]遗址均经过对自然山体的改造,兼具高等级墓地和祭坛的功能,可能都与观测二



图三 特奥蒂瓦坎平面图

(引自Shawn G. Morton, et al., Civic and Househol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at Teotihuacan, Mexico: A Space Syntax Approach,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Vol.22, No.3, Figure 1, 2012)

分和二至时的日出和日落方位有关^[23]。

在对宇宙结构的基本认知方面，中国和美洲中部地区文明也颇有相似之处。

中心和四方神树观念，中国先秦典籍多有记载。考古出土资料中，三星堆遗址相当于晚商时期的祭祀坑中出土有神鸟栖息的青铜“神树”^[24]。长沙子弹库帛书《四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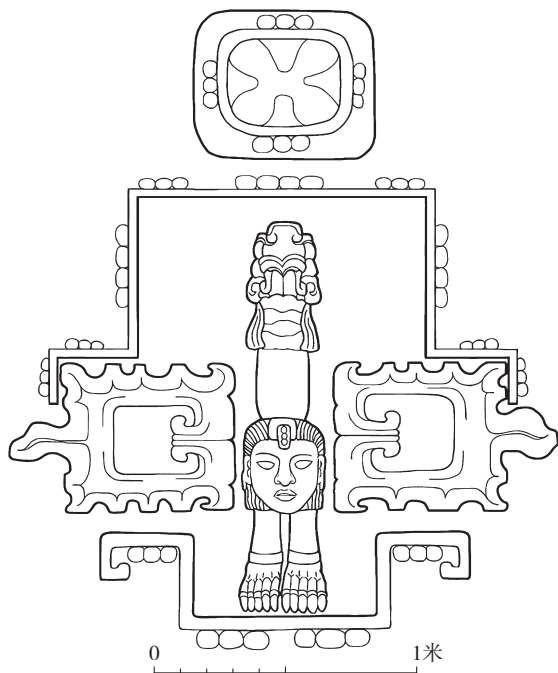
中有“捍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意为“青木树于东，赤木树于南，白木树于西，墨木树于北，而以黄木为中心柱，承三天之覆，立四极之载”^[25]。奥尔梅克文明的玉石雕刻中，常见宇宙中心和四方的主题^[26]。形如玉米粒的玉“斧形器”上，经常刻画玉米神居中，四角有初生玉米芽的图像（图五）。玛雅文明时期，出现五神树立于四方和中心的观念，并以东方为红色、南方为黄色、西方为黑色、北方为白色，中心为代表生命力的绿色。玛雅文明早期的圣巴托洛（San Bartolo）遗址（约公元前2世纪）的壁画中，描绘了神话英雄在五棵神树前以不同动物献祭并自刺出血，与树上大鸚鵡神斗法的场面，是最早的关于五棵神树的全面描绘，英雄人物的行为，应是为了奠定新的宇宙秩序^[27]（图六）。

总之，两个地区的文明中，宇宙秩序都是构

建人间秩序的根基。

二、巫覡通天

张光直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概念时，最重要的依据是二者有相似的“巫术和萨满文化”，即相信具有特殊能力的人物（巫覡或萨满）可以借助特殊法器和药物



图四 玉米神在龙头鸟腹中重生雕刻
(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建筑69N东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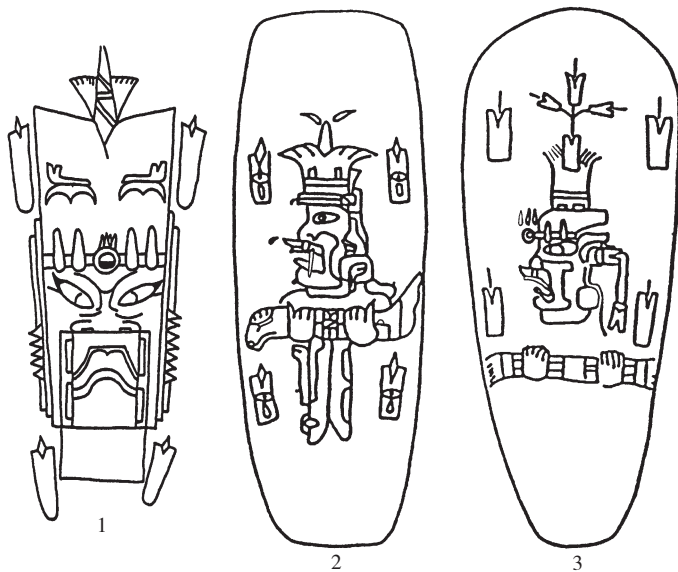
等，进入致幻状态，完成精神之旅，与超自然界交流互动，达成所愿^[28]。值得关注的是，萨满文化不止会停留在低级原始状态，

在早期国家构建中，往往会被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萨满式宗教。领导者会宣称具有沟通超自然神灵，维持宇宙秩序，给人间带来福祉的特殊能力，以此确立威望、获得权力^[29]。美洲最早的居民约2万年前从东北亚地区迁徙而来^[30]，当时应该已经形成颇为复杂的巫术和萨满文化。此后，两地在文明形成和早期国家构建进程中，也都形成了萨满式宗教，走上颇具相似性的注重宗教权力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述宏大建筑，实际正是精心搭建的举行宗教仪式、展示沟通天地的宗教能力的舞台，演出的主角，是具有最高宗教能力的领导者^[31]。

奥尔梅克文明未见明确的王者墓葬。但一般认为，其标志性的巨型人头石雕像，刻画的是头戴球员护具的国王形象。其厚实的嘴唇和下垂的嘴角表现出美洲豹的特征，宣示国王是如玉米神一样的优秀球员，并具有与美洲豹相互转化的萨满之力^[32]。重要的大型石雕，分布于特定位置，除了大型人头雕像，还有刻画国王神圣起源的王座，鸟类、

猫科动物和超自然怪兽的形象，更增添了场景的神圣性，也使其更具叙事性和情节性。

特奥蒂瓦坎文明中未发现明确的王宫、王墓，也未见明确的国王形象。但月亮金字塔、太阳金字塔和羽蛇神庙金字塔的堆积内，都有大量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精心组织的大规模仪式活动的遗迹。月亮金字塔可能与水神和带来降水的风暴之神的祭祀有关。其第四期建筑中发现有祭祀性墓葬。其中6号墓位有12具人牲，10具被捆绑泉首。动物牺牲包括鹰、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祭品包括1件绿石马赛克人像和9对大型黑曜石器。每对石器中，1件是羽蛇，另1件是风



图五 刻在玉“斧形器”上的奥尔梅克玉米神
1~3. 出自里奥·佩斯凯洛 (Rio Pesquero) 遗址 (引自Karl Andreas Taube, *Studies in Ancient Mesoamerican Art and Architecture: Selected Works by Karl Andreas Taube*, Vol.2, p.101, Figure 2, Precolumbia Mesoweb Press, 2022)



图六 圣巴托洛遗址品图拉斯（Pinturas）金字塔Sub-1建筑壁画局部
（引自Oswaldo Chinchilla Mazariegos, *Art and Myth of the Ancient Maya*, p.156, Figure 74,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暴神手持的闪电之杖。此外，还有7件风暴神陶罐^[33]（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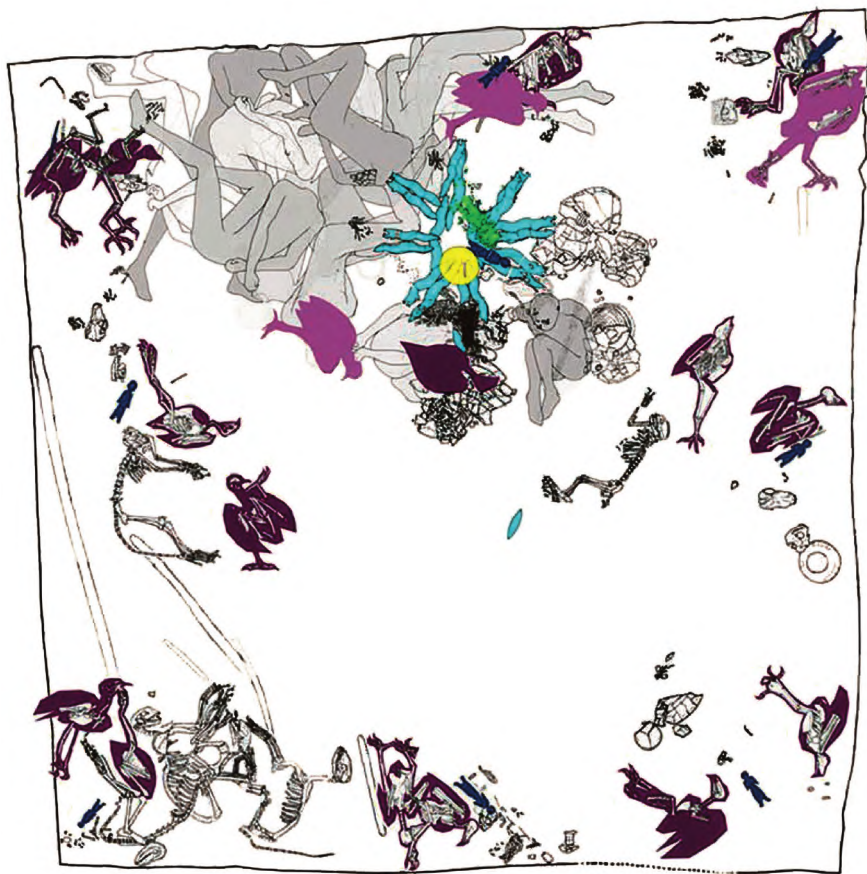
玛雅文明有丰富的文字和图像资料，明确展现城邦国王的宗教能力。科潘第13王瓦沙克拉胡恩·乌巴·卡威尔（Waxaklajuun Ubaah K'awiil，公元695～738年在位）兴建了大仪式广场，作为在公众面前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他主持了两个卡吞（玛雅长历法时间单位中的第4位，约相当于20年）终结仪式。一个是长历法9.14.0.0.0（公元711年12月5日）之日，为此竖立了C号石碑，表现自己身如联通天地的圣树，周围神灵环绕，带来万物重生；另一个是长历法9.15.0.0.0（公元731年8月22日）之日，当时的科潘王国达到极盛，第13王志得意满，竖立了B号石碑，表现自己在萨满状态中化身雨神查克（Chaac），屹立在鸚鵡神山如巨兽之口的洞穴中，玉米枝叶在他的王冠上蓬勃生长，象征万物繁荣（图八）。

在上述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西

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与长江下游的凌家滩社会，均选择将巫术和萨满文化宗教化，使之成为构建“古国”最重要的权力基础。

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存在“唯玉为葬”的现象^[34]，其主要玉器包括猪龙形器、勾云形器、筒形器、虎、鸟、龟、昆虫和玉人等，均与宇宙观和宗教仪式相关，表达的内涵包括：天极为天体顺利运行的枢纽所在，由天极之神控制，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为虎；猪为北斗之神，可能有辅助天极之神的作用；天极之顺利运转需要神鸟的维护，可以表现为神鸟对天极的托负和环护；神巫可以在萨满状态下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一样，实现与神鸟和神猪的沟通与转化，维护天极的运转。很明显，墓葬中的红山社会领导者，也是能力最强的神巫，在牛河梁这样的“圣地”，利用祭坛和“女神庙”这样的特定设施，佩戴和使用上述特殊玉器，完成沟通天地的仪式。

凌家滩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同样以随葬



图七 特奥蒂瓦坎遗址月亮金字塔内6号墓

(引自Leonardo López Luján and Saburo Sugiyama, *The Ritual Deposits in the Moon Pyramid at Teotihuacan, Teotihuacan: City of Water, City of Fire*, Fig.10.6, 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 2017)

玉石器为主，玉版、胸有八角星纹的猪首双翅鹰、龟和玉人等玉器均宣示佩戴者沟通天地的宗教能力，其“天极宇宙观”和昆虫蜕变状态下的人神沟通方式，与红山文化极其相似，应是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的结果^[35]。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07M23填土中出土1件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的玉石猪，头部写实，身体如蚕茧，表现北斗之神的蜕变状态。该墓共有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其中在墓主腰部发现1件抽象玉龟和2件同样为抽象玉龟的玉斜口筒形器，器内腔各有1枚或2枚玉签；玉钺和石钺10余件，放置在墓主身上^[36]。如果钺代表以武力维系的世俗权力的话，凌家滩领导者采取的是宗教和世俗权力并重的统治策略。

此后，良渚文化“熔合”红山和凌家滩的社会发展经验，创立更系统化的萨满式宗教，成为其构建早期国家的基础。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开创了以玉通灵的先声，为良渚文化之楷模，但其玉器多以形为主、以纹为辅，多写实或抽象的龟、鸟、猪龙、蝉、蚕、蛹蛭等动物形象，还有写实的人像，纹饰只起到辅助作用。良渚文化时期，标准化玉琮的出现，男女通用的冠状梳背，

男性专属的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女性专属的璜和圆牌组佩，均成为稳定的玉器组合；完整或简化的“神人兽面”图像以及旋涡状地纹，形成程式化的表现方式。“神人兽面”图像中，“神人”羽冠，方面，圆目，双臂回折如展开的双翅，下体弯屈，脚已经变为如勾的鸟爪，表现的并非神人，而是神巫与鸟相互转化的状态。兽面有重环巨目，直梁蒜头鼻，四獠牙阔口，正是猛虎——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37]。

以抽象而规范之器、刻规范之纹的玉器制作范式已经形成，是宗教信仰“标准化”和系统化的明确证据。如此开创性的宗教变革，利于在大范围内统一思想、全面推广，最大程度地凝聚人群及建立宗教领袖的权威。



图八 科潘B号石碑

(据Ricardo Agurcia Fasquelle y Vito Veliz, *Manual de los Monumentos de Copán, Honduras*, p.132改绘, Copán: Asociación Copán, 2010)

反山墓地M12出土随葬品658件,其中647件为玉器(不计大量玉粒和玉片)。冠状梳背、三叉形器、锥形器等组成的头饰是最高等级头饰组合。钺仍是权力象征,被称作“钺王”的玉钺长17.9、刃宽16.8厘米,有精美的配套钺柄端和柄尾玉饰,其上有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被称作“琮王”的玉琮重达6.5千克,四面均有“神人兽面”的完整图像^[38]。这座“王陵”区最“豪华”的墓葬,是王权和神权密切结合的生动例证。

良渚文化虽在距今4300年左右突然衰落,但对龙山时代诸文化、二里头文化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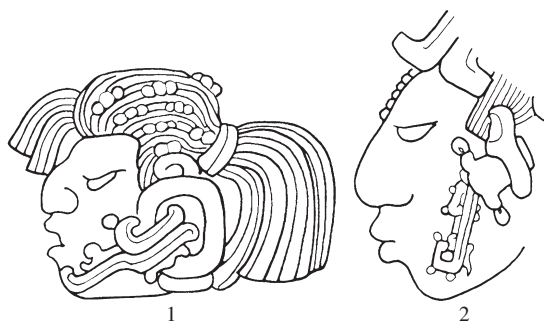
深刻影响。如此深厚的萨满式宗教传统,在商代发展到新高度,张光直对此有深入探讨^[39]。

三、互鉴新知

美洲中部地区诸文明和中华文明早期,在依据宇宙秩序构建社会秩序和以萨满式宗教获取权力及凝聚社会方面既多相似性,其与萨满式宗教信仰相关的图像、文字和民族学资料又如此丰富,自然对获得中华文明早期宗教信仰内涵的新知极具启发。

在美洲中部地区,绿色的美石被认为凝聚了自然生命的力量,备受珍视。该地区符合矿物学定义的“真玉”只有翡翠,而且仅产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交界处的牟塔瓜河谷,绿色和深蓝色的蛇纹石等与玉相近的石料,同样重要。拉文塔遗址的一座大型祭祀坑长19、宽15、深7米,填埋了总重量达1000吨的蛇纹石块,近顶部的一个平面上,用像砖一样规整的绿色蛇纹石块摆放了美洲豹的面部图案,赋予了整个场景强大的生命力量^[40]。玛雅时期的国王和玉米神图像,多佩玉耳珰,其中探出简化的、省略下颌的龙头,代表佩玉者体内丰沛的生命气息^[41](图九)。玉米神形象更是满身玉饰,前额和脑后常幻化出玉耳珰,从中探出简化龙头或玉米叶(图一〇)。

《荀子·德行》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礼记·聘义》也借孔子之口,提出“君子比德于玉”。这大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赋予玉的道德内涵。但中国史前先民对玉的认识,应更接近美洲中部地区,绿色美玉也备受珍爱。兴隆洼文化玉块多为黄绿色。红山文化重要玉器也多绿色,以之制作的蝥蛄,形色兼备。良渚文化玉器本色同样近绿色。石峁遗址皇城台区域发现相当数量的玉器,有些应是嵌在大型石砌基址内的;东门址的发掘中,同样发现在石墙中砌入玉器的现象,这很可能与美洲中部地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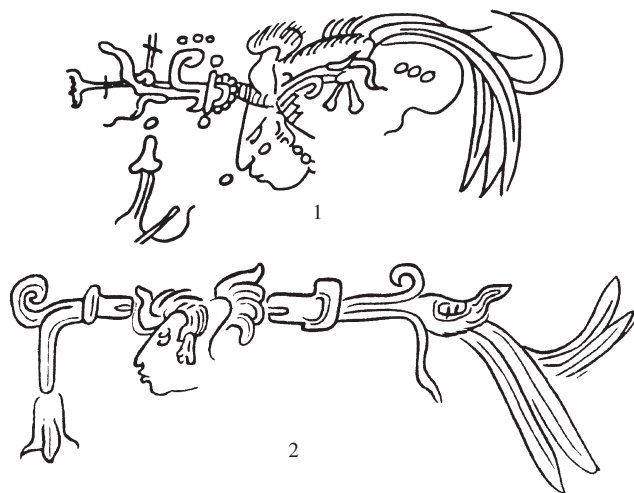


图九 玛雅国王佩戴玉耳珰中探出无下颌龙头的图像
1.道斯皮拉斯（Dos Pilas）遗址8号石碑 2.雅什奇兰（Yaxchilan）遗址25号门楣（1引自Peter Mathews, *Notes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ack of Dos Pilas Stela 8, The Decipherment of Ancient Maya Writing*, pp.394-415, Figure 40.2,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2001; 2引自Ian Graham and Eric von Euw, *Corpus of Maya Hieroglyphic Inscriptions*, Vol.3, Part1, p.55,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1977）

是以玉为建筑增添神圣性。有学者将此现象认为是抢夺玉器而不知其用的“暴发户”行为，实在是低估了石崩人构建圣地的用心。

不同物种的转生和特殊沟通是颇为典型的萨满式观念。

玛雅文明关于玉米神重生的神话中，玉米神死后，冥王将其骨灰撒入河中，河中鲶鱼吃了这些骨灰，等于聚集了玉米神的身體残留；神鸟又将这些鲶鱼吃掉，聚齐了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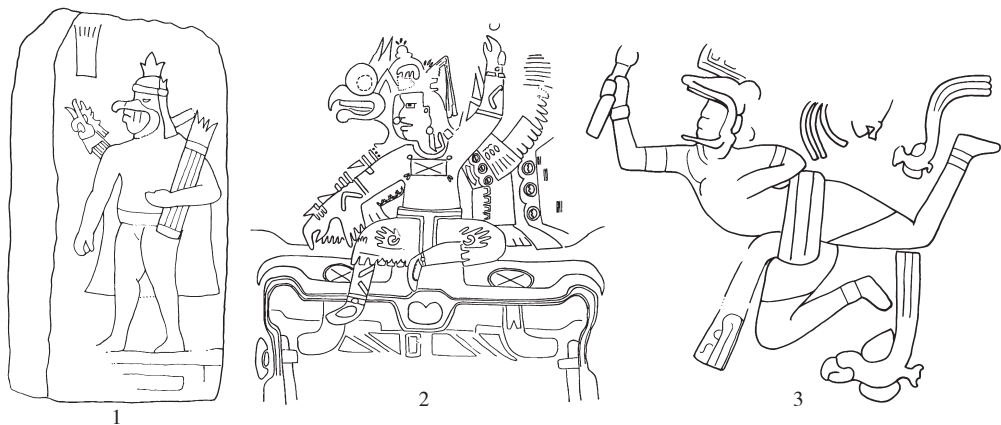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陶绘画筒形杯所见玛雅图像中的玉米神头部
（1、2引自Karl Andreas Taube, *Studies in Ancient Mesoamerican Art and Architecture: Selected Works by Karl Andreas Taube*, Vol.1, p.79, Figure 1, Precolumbia Mesoweb Press, 2018）

神的身体，玉米神得以在其体内完成重生^[42]。

《庄子·逍遥游》中有鲲鹏化为鹏的描述，可能是史前时代神话的孑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主题，正是此鲲鹏之变，表现的是鸟在鱼体内完成孕育生长，从鱼口内飞出^[43]。著名的“鸛鱼石斧图”常被解读为以鸟为图腾的部族战胜以鱼为图腾的部族^[44]。但以我们讨论的萨满式宗教的视角观察，更可能表现墓主既拥有与鱼鸟转化相关的宗教能力，也有钺代表的世俗权力。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三星堆祭祀坑中，金杖K1：1上刻有四组鱼鸟组合，鱼头被箭矢射中；牙璋K1：235-5呈鱼形，顶部如张开的鱼嘴，内有昂首扬翅之鸟，生动表现完成孕育的神鸟从鱼口中诞生的场面。与鱼鸟组合相关的信仰被以这样最高级别的形式物化，清楚显示了该信仰在三星堆宗教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帮助神鸟从鱼体诞生和与神鸟沟通是三星堆领导者着力宣示的能力。

人鸟转化是美洲中部地区文明萨满式转化的重要主题，在奥尔梅克文明时期就已经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圣米古艾尔·阿木库（San Miguel Amuco）遗址石碑上，有头戴鸟冠王者形象（图一一，1）。奥什托提特兰（Oxtotitlan）洞穴壁画中，有一人头戴鸟冠，双臂有羽毛如鸟翅，腰围鸟羽裙，坐在象征天界的獠牙蛇面上（图一一，2）。查尔卡金戈（Chalcatzingo）遗址的12号纪念碑上，刻画了一飞翔之人，脚边下为金刚鹦鹉，上为绿咬鹃（图一一，3）。如前所述，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图像中的神人，表现的正是良渚神巫正在转化为神鸟的状态。龙山时代，山东龙山文化、江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和陕北石峁文化中，都有头顶鸡冠发、脑后披发末端卷起的玉雕或石雕人头像，也是人鸟合体的状态。人向鸟的形态转变的形象，在商



图一— 奥尔梅克文明人鸟转化图像

1. 圣米古艾尔·阿木库遗址石碑头戴鸟冠王者形象 2. 奥什托提特兰洞穴壁画 3. 查尔卡金戈遗址12号纪念碑图像 (1、3分别转引自Karl Taube, *Lighting Celts and Corn Fetishes: The Formative Olme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ize Symbolism in Meso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Southwest*, *Olmec Art and Archaeology in Mesoamerica*, p.312, Fig.15f, p.308, Fig.11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0; 2转引自David C. Grove, *Faces of the Earth at Chalcatzingo, Mexico: Serpents, Caves, and Mountains in Middle Formative Period Iconography*, *Olmec Art and Archaeology in Mesoamerica*, p.282, Fig.8,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0)

代和西周时期的玉器中有更明确的表现。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藏鹰攫人首玉器，可能为肖家屋脊文化作品，人首也有鸡冠发和末端勾起的披发，这是另一种人鸟沟通主题的表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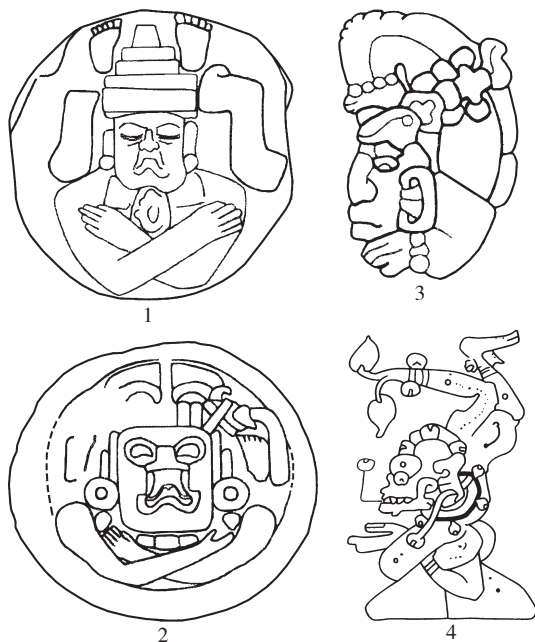
人与美洲豹的沟通转化，是美洲中部地区图像的重要主题。美洲豹是该地区最凶猛的陆地动物，一些神灵会化为美洲豹的形象，玛雅国王也常以美洲豹为灵伴（Spirit Companion，玛雅语为way），即自己在梦中的动物形象。奥尔梅克文明时期，奥什托提特兰洞穴壁画中，描绘了带冠王者与美洲豹交合的画面（图一二，1）。美国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中心藏奥尔梅克文物中，也有人转化为美洲豹状态的石雕像（图一二，2）。如上所述，中国史前时代宇宙观中，虎为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图像中的圆眼、四獠牙兽

面，正是猛虎的形象。该图像表现的是良渚神巫化身神鸟，与天极之神沟通，参与宇宙秩序的维护。龙山时代，肖家屋脊玉器刻画图像和石峁石雕中，都表现了猛虎口对鸡冠顶发、脑后披发人首的主题。商代青铜器则有“虎食人”主题。这些图像表现的都是人与天极之神沟通的转态。



图一二 奥尔梅克人与美洲豹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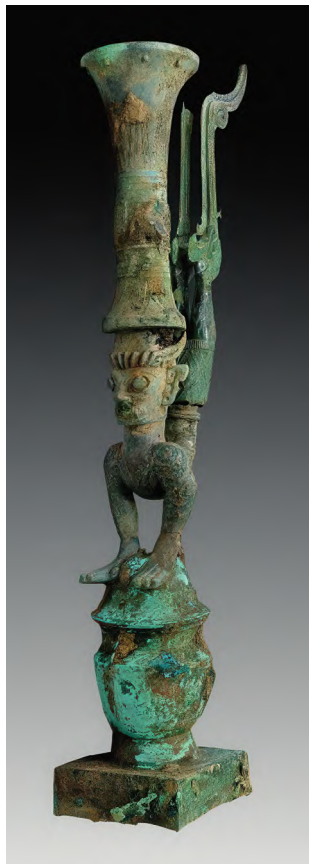
1. 奥什托提特兰洞穴壁画 2. 敦巴顿橡树园中心藏石雕 (1引自Brendan C. Stanley, *The Dawning of Creation in the Central Mexican Highlands: Interpreting Olmec Style Symbolism at the Formative Period Sites of Chalcatzingo, Oxtotitlán, and Juxtlahuaca*, p.152, Figure 44, Texas State University, 2020; 2引自Karl A. Taube, *Olmec Art at Dumbarton Oaks*, p.59, Plate 5,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4)



图一三 美洲中部地区柔术者形象

1.巴兰坎 (Balancan) 遗址石祭坛浮雕 2.贝伦 (Belen) 遗址石祭坛浮雕 3.萨利特隆·维艾侯遗址玉米神玉雕像 4.德累斯顿绘本死神 (引自Gerardo Gutiérrez, *Acrobatic Dances and Games of Mesoamerica as Ritual-Entertainment, Prehistorica Game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Subarctic to Mesoamerica*, p.242, Figure 14.5b、14.5d、14.6f、14.7a,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7)

奥尔梅克文明时期流行柔术者 (Contortionist) 形象。墨西哥维拉科鲁兹 (Veracruz) 和塔巴斯科 (Tabasco) 州4处遗址采集的石祭坛上, 柔术者均双手抱在胸前, 以肘部和胸部支撑, 双足放在头顶或头两侧, 头部有模仿玉米幼穗和玉米种发芽的头饰 (图一三, 1, 2)。玛雅文明时期, 常见玉雕柔术者形象。洪都拉斯萨利特隆·维艾侯 (Salitron Viejo) 遗址出土者, 双手向前, 以小臂支撑, 身体同样极度弯屈, 双足置于头顶。此件玉米神头顶有代表玉米的十字符 (玛雅语为K'an, 意为黄色的, 珍贵的) (图一三, 3)。玛雅文明在公元900年左右衰落之后, 美洲中部地区进入后古典时代, 柔术者形象仍然流行。保存至今的后古典时代绘本上, 有不少各种姿态如柔术者的神祇的形象。德累斯顿绘本死神头为骷髅, 以死



图一四 三星堆鸟爪屈身倒立铜人像 (K8⑨:121、K8⑨:122、K2③:327)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者眼珠为项链和头饰, 以肘部支撑, 身躯倒立, 左足已经变成可可树枝叶 (图一三, 4)。美洲中部地区的宗教仪式活动中, 会有类似的仪式表演^[45], 学者多认为主要是表现玉米等重要农作物和可可树等重要植物的发芽和生长。通过以高难度的技巧模拟重要植物的生长过程, 一方面, 展示对万物生长奥秘的通晓和沟通万物能力的掌握, 令观众心生赞叹和敬仰; 另一方面, 这样的高难度模仿, 也会产生“模仿巫术”般的效果^[46], 与超自然力量沟通, 切实促进重要作物和植物的生长。

2022年, 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西北侧出土1件腿部缺失的屈体倒立铜人像, 可与1989年发掘的二号祭祀坑内足为鸟爪的腿部 (K2③:327)^[47]拼合。该器物下部有方座, 座上为带盃形盖的圆罍, 人像倒立于圆罍的盃形盖上, 头顶觚形器。双手大于正常比例, 支撑在罍盖前端, 双臂微屈, 昂首挺胸, 目视前方; 躯干弯屈成U形, 双腿垂直向上, 双足均为鸟爪, 各紧抓一勾喙直体分尾之鸟 (图一四)。人像造型奇特, 如同杂技中高难度的柔术动作。这件器物的造型前所未见, 但与上述美洲中部地区文明的柔术者形象颇具相似性。考虑到三星堆文化和

商文化与美洲中部地区古代文明同样浓厚的萨满式宗教气氛，我们或可作一推测：鸟爪屈身倒立人像，可能是对真实的宗教仪式中类似柔术表演的艺术表现。考虑到在三星堆信仰体系中，鱼鸟的成功转生为重要内容，或许事关天体正常运转、四时有序、万物繁育、国家兴旺，此鸟爪屈身倒立人像，似为对鱼鸟转生过程的模拟表演^[48]。

对美洲中部地区图像资料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必将为中国史前信仰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四、连续与破裂

上述讨论，大致对应张光直提出的中国考古学世界性的第二方面，即通过探讨“世界史关于文化、社会变迁模式”，生发出对中国丰富的考古和历史材料的新认识。

对于第三方面，即“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张光直提出：“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间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份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49]。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致如此。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则主要以技术手段突破自然的束缚，开辟了“破裂性”的文明形成和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50]。很明显，这一论断的提出，得益于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比发现的共性，以及将二者与被定义为西方

文明源头的苏美尔文明比较发现的差异性。

西方学者对“连续”与“破裂”说提出的质疑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萨满和原始宗教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51]；二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是否真的缺乏“技术突破”^[52]。

对于第一方面，“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这一判断，经张光直对中国史前和商代萨满式宗教的开创性研究，已经得到重视^[53]；更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及史前图像的新解读所证实，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但目前，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宗教权力的重要性仍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宗教取向的社会发展道路被认为是误入歧途，“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必然失败，对后续文明发展没有影响，只是反面教材^[54]。最初的王朝之形成，是“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序、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的胜利^[55]。因此，我们在美洲中部地区与中华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下，尤其需要重申这一判断，以明确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中宗教权力的重要性。

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如“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形成期，代表当时最高发展水平的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均选择了宗教取向的社会发展道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宗教性也值得深入探讨。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像的新解读，已经证明庙底沟社会鱼鸟转生、万物繁育信仰的盛行。不能排除，在西坡等遗址中，位于聚落核心位置的“殿堂”规模的大型房址，也会举行与之有关的仪式活动。墨西哥阿瓜达菲尼克斯（Aguada Fenix）遗址的激光雷达探测和最新考古发掘，发现了相当于奥尔梅克文明时期规模庞大的人工堆筑土台，布局蕴含宇宙观，明显用于大型宗教仪式活动；但遗址上未见劳伦佐和拉文塔等奥尔梅克文明大型遗址中标志特殊宗教特权的巨型石雕和埋藏大量玉器的祭祀坑，这正反

映出一种更“集体取向”的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道路^[56]，对探讨庙底沟社会可能具备的“宗教性”颇有启发。

如上所述，良渚文化“融合”红山和凌家滩的社会发展经验，创立更系统化的萨满式宗教，宗教权力成为其构建早期国家的基础。同时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虽然高等级墓葬并无明确仪式用品，但也发现大型仪式活动遗迹。石家河遗址灰坑中，发现巫师抱鱼和鱼尾之鸟的陶塑。三房湾地点发现石家河文化大规模的红陶杯堆积，陶杯数量达到惊人的200余万件^[57]。当时集体仪式的宗教性，值得深入探索。

良渚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良渚开创的依靠宗教权力构建早期国家方略的黯然退场，而是如一石入水，激起无限波澜。良渚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开始在江汉、海岱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肖家屋脊、山东龙山、陶寺、石峁及齐家等文化中流行，玉器成为这些地区表达权力和等级的重要载体；相似的獠牙神面、龙形动物和鹰的形象在广大地区出现，似乎暗示某种神话和信仰开始广泛传布；这些现象让人联想起美洲中部地区在特奥蒂瓦坎文明衰落后，玛雅文明各城邦对这一圣地的争相模仿；以及玛雅文明衰落后新的羽蛇神信仰的广泛流行^[58]。虽然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因果尚需新的考古发现和对现有资料的仔细梳理才能探明，但已经足以说明良渚的开创性政治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一定对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夏王朝核心文化的代表二里头文化最精彩的遗物包括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器和玉器等，均与宗教仪式有关。使用玉瓚（柄形器）的裸酒之礼可追溯到良渚文化^[59]。目前发现的二里头遗址重要墓葬主要位于宫殿区的庭院之内。2001 V M1和2001 V M2在3号基址的庭院内并排而列，打破早期路土，又被其后的路土覆盖，埋葬后建筑仍然继续

使用。与仪式活动密切相关的随葬品表明，这些墓主明显是具有宗教能力和权力的社会上层，他们的墓葬无疑会赋予其所在建筑群宗教力量。可见，普遍被称作“宫殿区”的二里头核心建筑群的功能需要重新思考，二里头遗址神圣空间构建是非常值得探索的方向。对二里头文化宗教性的新思考，也使得被广泛认可、并经过张光直充分讨论过的商代宗教权力的重要性，不再显得突兀；对王国维所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60]，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第二方面，我们也认为，对张光直提出的美洲中部地区和中华文明在宗教取向上的相似性的认定，并不能让我们全盘接受以是否有“技术上的变化”为标准提出的“连续”与“破裂”文明形成道路的二分法。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复杂社会形成进程中，权力有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三个基本来源^[61]。以宗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都是酋邦和早期国家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62]。宗教在两河流域城邦国家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63]，似不宜将苏美尔文明形成的主要原因简单认定为以技术手段突破自然的束缚。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食物的积累，是公认的所有社会发展的前提，中国和美洲中部地区均非例外。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遗址群大规模水利设施、茅山遗址水稻田和良渚文化精制的石犁、石镰，都展示着良渚人以技术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良渚古城核心莫角山南侧的池中寺地点发现的大量炭化稻谷堆积^[64]，也是经济权力在良渚早期国家构建的实践中基础作用的明证。距今4000年前后，羊、牛和小麦西来引发的生业经济革命，也在早期王朝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羊和牛的普遍饲养及“次级产品”开发无疑极大提高了西北地区人群的生活质量^[65]，在此背景下，才能解读

石峁这样的复杂社会的形成,以及由此引发的、最终熔铸出早期王朝的西高地和东平原地区的激烈互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初步形成的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中,第一个要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分工^[66]。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在依据世界范围考古资料对文明起源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城市革命”,即文明形成的十条标准^[67],也以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为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并未以之为两河流域独有特征。

从人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上看,判断是否“破裂”的标准,可能并不是技术的突破,而是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讨论“轴线时代”概念时提出的与神话时代的告别和人类在哲学思辨中自身认知的觉醒^[68]。这样的“破裂”或“超越”,在东西方文明中均曾发生,但方式和内涵不同。因此,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真正有可能“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探索方向,可能是中国早期宗教思想“人文化”、转化为政治理念的中国智慧。天极崇拜是中国史前萨满式宗教的核心内容^[69],至迟在商代,天极之神已经完成向“帝”的转变。在西周时期,又完成向道德化之“天”的转变^[70],开启春秋时期(也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轴心时代”)的人文化政治思想形成的进程。中国式“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均与此密切相关。

以比较视角,对美洲中部地区和中华文明的初步观察和思考,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站在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的起点,只有放眼大九州,以世界文明的视角,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地位,以中华文明的视角,观察世界文明之发展,才能用中国的考古资料“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此前提下,张光直提出的中国考古学世界性的第一方面,即“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有何大的重要性”,也才能得到清晰的解答。

注 释

- [1] 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 [2]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见《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 [3] John Baines and Norman Yoffee, *Order, Legitimacy and Wealth: Setting the Terms, Order, Legitimacy and Wealth in Ancient States*, pp.13–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 Christopher A. Pool, *Olmec Archaeology and Early Meso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Takeshi Inomata, et al., *Archaeological Application of Airborne LiDAR to Examine Social Changes in the Ceibal Region of the Maya Lowland*, *PLoS ONE*, 13(2): e0191619, 2018.
- [6] 李新伟:《循环往复:玛雅历法的时间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29日第7版。
- [7] E组建筑模式得名于玛雅文明早期城邦瓦沙克吞遗址的E组建筑,参见Oliver G. Ricketson Jr. and Edith Bayles Ricketson, *Uxactun, Guatemala: Group E—1926–1931*,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7. 目前可知,此类型建筑组合在奥尔梅克文明时期已经出现,很多学者认为与观察太阳在不同季节从地平线升起和降落的方位有关。参见Grant R. Aylesworth, *E-Group Arrangements, 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 pp.783–791, Springer Reference, 2015.
- [8] Frank F. Reilly III, *Mountains of Creation and Underworld Portals: The Ritual Function of Olmec Architecture at La Venta, Tabasco, Mesoamerican Architecture as Cultural Symbol*, pp.14–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9] George L. Cowgill, *Ancient Teotihuacan: Early Urbanism in Central Mexic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0] Saburo Sugiyama, *Worldview Materialized in Teotihuacan, Mexico*, *Latin American Antiquity*, 4(2), pp.103–129, 1993.

- [11] Guilhem Olivier, *Sacred Bundles, Arrows, and New Fire, Foundation and Power in the Mapa de Cuauhtinchan No.2, Cave, City, and Eagle's Nest: An Interpretive Journey through the Mapa de Cuauhtinchan No.2*, pp.281-313,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7.
- [12] William L. Fash, *Scribes, Warriors and Kings: The City of Copán and the Ancient Maya*, pp.19-26, Thames & Hudson, 2001.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3号大墓》，《考古》2020年第8期。
- [15]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 [16] 李新伟：《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新认识》，《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
- [1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 [18] 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19] 李新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对鸟”主题》，《中原文物》2021年第5期。
- [20] 李新伟：《裂变、撞击和熔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 [2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 [23] 刘斌、朱雪菲：《城郊的观象台与贵族墓地》，见《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 [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214~23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25] 李零：《子弹库帛书》（下编）第63、64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 [26] Karl A. Taube, *Olmec Art at Dumbarton Oaks*, pp.29-34,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4.
- [27] Karl A. Taube, et al., *The Murals of San Bartolo, El Petén, Guatemala: Part II: the West Wall*, Boundary End Archaeology Research Center, 2010.
- [28]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段满福译：《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 [29] Alice B. Kehoe, *Shamans and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ritical Thinking*, pp.1-7, Waveland Press, 2000.
- [30] Anne C. Stone, The lineages of the First Human to Reach Northeastern Siberia and the Americans, *Nature*, 570(7760), pp.170-172, 2019.
- [31] 李新伟：《构建萨满式宗教舞台：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的特质和启示》，《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
- [32] Ann Cyphers, Olmec Architecture at San Lorenzo, *Olmec to Azte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Ancient Gulf Lowlands*, pp.96-114,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 [33] Saburo Sugiyama and Ruben C. Castro, The Moon Pyramid Project and the Teotihuacan State Polity: A Brief Summary of the Excavations in 1998-2004 Excavations, *Ancient Mesoamerica*, 18(1), pp.109-125, 2007.
- [34] 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 [35] 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 [3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 [37] 李新伟：《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图像的内涵及演变》，《文物》2021年第6期。
- [3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第43~5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 [39]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 [40] 同[8]。
- [41] Karl A. Taube, The Symbolism of Jade in Classic Maya Religion, *Ancient Mesoamerica*, 16(1), pp.23-50, 2005.

- [42] Michael J. Grofe, *The Recipe for Rebirth: Cacao as Fish in the Mythology and Symbolism of the Ancient Maya*, Department of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2007.
- [43] 李新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鱼鸟组合图像》,《考古》2021年第8期。
- [44] 严文明:《〈鹤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
- [45] Gerardo Gutiérrez, *Acrobatic Dances and Games of Mesoamerica as Ritual-Entertainment, Prehistoric Game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Subarctic to Mesoamerica*, pp.235-258,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7.
- [46] J. G. 弗雷泽著,汪培基等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
- [4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169~17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48] 李新伟:《三星堆铜顶尊屈身鸟足人像和中美地区柔术者形象》,《四川文物》2022年第6期。
- [49] 同[1]。
- [50] 同[2]。
- [51] 普鸣著,张常焯、李健芸译,李震校:《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 [52] Roderick Campbell, *Violence, Kinship and the Early Chinese State: The Shang and Their World*, pp.1-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53] 同[1]。
- [54]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 [55]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见《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 [56] Takeshi Inomata, et al., *Origins and Spread of Formal Ceremonial Complexes in the Olmec and Maya Regions Revealed by Airborne Lidar, Nature Human Behaviour*, 5(11), pp.1487-1501, 2021.
- [5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9期。
- [58] 李新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雕刻》,《考古》2018年第10期。
- [59] 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期。
- [60]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上),中华书局,2004年。
- [61] Timothy K.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2] Colin Renfrew, *The Archaeology of Religion, The Ancient Mind: Element of Cognitive Archaeology*, pp.47-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3] 彭博:《两河流域文明探源的三个研究路径》,《考古》2024年第9期。
- [6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第179~181页,文物出版社,2019年。
- [65] 陈相龙:《从家畜饲养方式看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与甘青地区生业经济的分化》,见《早期中国研究》第3辑,文物出版社,2018年。
- [66] 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 [67] V. Gordon 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1(1), pp.3-17, 1950.
- [68] 卡尔·雅斯贝斯著,李夏菲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漓江出版社,2019年。
- [69] 李新伟:《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
- [70]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 (责任编辑 李学来)

本期要览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墓葬发掘简报 在科潘遗址8N-11号居址北侧建筑中,共发现大型墓葬3座、小型墓葬12座。墓葬多属于奠基型墓葬,年代均在古典时代晚期,即相当于科潘第12王至第16王统治时期。这为了解玛雅贵族的埋葬习俗、北侧建筑的营建过程及方式,探讨该居址贵族的身份等级、北侧建筑的功能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西侧中、南部及南侧第Ⅰ层建筑 2017~2019年,对科潘遗址8N-11号居址西侧中、南部及南侧第Ⅰ层建筑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古典时代晚期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建筑69S还发现7组表现“神圣包裹”的马赛克石雕。8N-11号院落第Ⅰ层建筑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各组建筑功能不一,体现了玛雅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连续与破裂:中华文明与美洲中部地区文明比较研究的启示 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与美洲中部地区文明具有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宇宙秩序是确立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基础,重要遗址核心区域的规划均蕴含天文知识;选择注重宗教权力的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领导者也是具有最高沟通天地能力的宗教人物。但这些相似性并不能让我们接受“连续”与“破裂”文明形成道路的二分法。

美洲中部地区E组建筑与玛雅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玛雅文明最早的大型仪式性建筑,E组建筑在玛雅低地的出现及发展演变,与玛雅文明的兴衰过程相始终。它是玛雅人依托宇宙知识和创世神话而建造的神圣空间,是玛雅宇宙观的物化表现。以此神圣空间为“舞台”的宗教仪式实践,有效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在玛雅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南洛阳市龙门香山寺遗址二号建筑基址 香山寺二号建筑基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砖塔遗迹,由地下夯土基础、地上砖塔遗迹及院落组成,还发现与舍利瘞埋有关的空间;晚期为方形建筑基址,由地上夯土台基、踏道及散水组成。出土遗物为大量陶质、石质建筑构件,以及石造像和石棺等佛教遗物。这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寺院建筑和佛教瘞埋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